

## 原住民族知識體系與客家知識體系\*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暨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 摘要

我們先由知識以及社會知識論切入，特別是瞭解社會場欲與知識取得的關係。接著，我們由群體中心主義來理解文化如何影響知識的生產，並探索如何透過彩繪知識論來擺脫知識種族主義的羈絆。再來，我們重心放在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以及客家知識體系的解析。最後，在提供結與之前，我們將以自身的經驗來與先前的理論作對話。

**關鍵詞：**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客家知識體系、社會知識論、彩繪知識論

---

\* 發表於台灣客家研究學會主辦「台灣客家發展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社科院國際會議廳 2012/11/24。

收割期已經過去，夏天已經完結，我們仍沒有獲救！

舊約聖經（耶肋米亞書，8：20）

It is a peculiar sensation, this double-consciousness, this sense of always looking at one's self through the eyes of others, of measuring one's soul by the tape of a world that looks on in amused contempt and pity.

W. E. B. Du Bois (2007: 168)

We refuse to be What you wanted us to be; We are what we are: That's the way (way) it's going to be. You don't know!

*Babylon System* (Bob Marley, 1979)

## 壹、由知識到社會知識論

所謂「知識<sup>1</sup>」(knowledge)，是指我們對於某個東西 (subject) 的理解。「知識體系<sup>2</sup>」(knowledge system) 可以有兩種解釋，首先，就組織上而言，它是指與知識生產、組織、傳遞、分配、儲存、以及運用的相關機構及角色 (Holzner & Mark, 1979: pt. 3)；另外，就實質內容而言，它也可以指在特定的社會結構，包括權力關係、溝通的網路、或是經濟體系，所構成的參考架構、以及進而塑造的知識觀點 (Holzner & Mark, 1979: xviii-xx, 173-75)。關於知識體系的討論，大體有微觀、及宏觀兩個途徑：前者著重於特定的傳統知識的採集，譬如原住民族的生態保護智慧，後者則關心知識體系的理解與建構；前者以人類學者為主，後者屬於哲學的範疇。

在哲學裡，對於知識的研究、或是有關於知識的理論，稱為「知識論」(epistemology<sup>3</sup>) (圖 1)。知識論主要在探討「甚麼是知識」、「知識是如何取得的」、「我們可以理解到何種的程度」、以及「如何知道『我們已經

<sup>1</sup> 西方的哲學傳統將知識的構成分為三部份：相信 (belief)、為真 (truth)、以及有道理 (justification)，也就是「有道理相信是真的」(justified true belief) (Moser, et al., 1998: 14-16)。Stanfield (1985: 390-91) 根據發展的過程，將社會知識分為魔法、神學、冥想、科學、以及技術。我們這裡所提的知識是「科學知識」(scientific knowledge)。

<sup>2</sup> 或是稱為「知識的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 of knowledge) (Holzner & Mark, 1979: xviii)。

<sup>3</sup> 在希臘文，episteme 的意思是知識，logos 是理論或是解釋 (Moser, et al., 1998: 3-4)。知識論探討的是「知道」(knowing)，而本體論研究的是「存在」(being)。

理解了』」（Wikipedia, 2012; Moser, et al., 1998: 1）。就取得知識的各種途徑當中，「社會知識論」（social epistemology）強調知識的社會面向，也就是社會因素如何影響知識的生產，或是說，科學是鑲嵌在社會脈絡，因此，如果想要了解知識的治理，就必須研究知識的社會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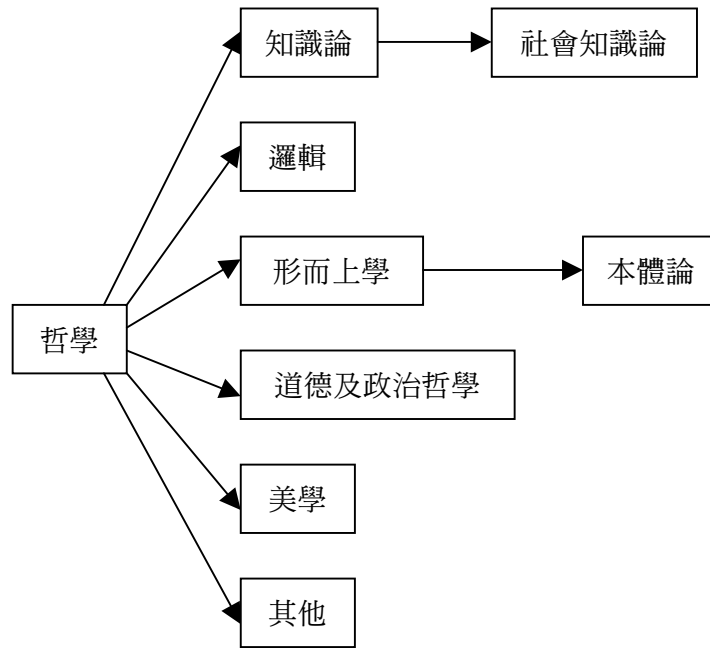


圖 1：哲學的內容

最早使用社會知識論的是圖書館學家 Jesse Shera，強調社會結構（social fabric）對於思想生產、流通、整合、以及消費過程的影響<sup>4</sup>；不過，從 Plato、John Lock、到 David Hume 都有提到知識的社會性。當然，我們比較熟悉的是 Karl Marx 所提出的意識形態理論，指出包括人的理念、世界觀、或是意識在內，都是受到他們的社會情況或是利益影響。Karl Mannheim 進一步發揚光大，認為每一個社會團體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他們的社會情況或生活條件。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更是主張，一個行為者（agent）若

<sup>4</sup> 這部份整理自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EP, 2006a）。

要獲得解放跟啟蒙，就必須去發掘隱藏在環境中的壓迫，以便決定自己的真正利益。Michael Foucault 更是直言，知識的追尋其實是在服務政治權力及社會支配。

如果說古典知識論的特徵是追尋真理，那麼，上述哲學家的知識強調的是心理過程，因此可以歸類為「個人的知識論」(*individual epistemology*)。相較之下，Alvin Goldman 於 1970 年代末期及 1980 年代中期提出「社會的知識論」(*social epistemology*)，強調社會互動的過程對於知識生產的影響，特別是透過結構的制度化，將特定的價值灌輸為「真實的價值」(*veritistic value*)<sup>5</sup>。基本上，個人知識論的關注在描述、或是解釋，而社會知識論關心的是規範。

接著出現的反古典知識論，比較想要理解、甚至於顛覆知識生產背後的社會力量<sup>7</sup>；他們挑戰所謂的普世理性，強調特定社群／共同體有其文化及理性規範，也就是說，知識一定會受到社群、文化、或是脈絡所約制。對社會因素影響知識產生的方式，有兩種看法：(一) 知識在基本上就是政治權力鏖戰的場域<sup>8</sup>，因此，科學社會學者、或是科學歷史學者的責任，就是想辦法打破科學知識的權威，尤其是揭露現有的科學信念，探究到底是如何在特定的社會歷史片段中被炮製出來的<sup>9</sup>；(二) 所有知識都是經過社會建構而來，也就是說，我們所看到所有被呈現出來的科學真相，都是被建構出來的，這就是社會建構主義 (*social constructivism*) (圖 2)。總

<sup>5</sup> 不過，一直要到 1980 年代末期及 1990 年代初期，社會知識論才在知識論學界大放異彩 (SFP, 2006b)。

<sup>6</sup> 由於人類社會往往寧可信有權有勢者所說的話，因而造成「知識論的不公義」(*epistemic injustice*)。譬如在台灣，學界的支配者認為理工科的人所從事的才是科學、或是論文發表 SSCI 期刊、或是外國期刊的才是「特殊優秀人才」。當然，這樣的關懷難免被誤解為將知識「政治化」。

<sup>7</sup> Goldman (2010) 因此認為這一派不能算是真正的社會知識論，不過，SEP (2006a) 認為這是舊瓶新酒，不傷大雅。

<sup>8</sup> 「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或是「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 強調要找出決定科學知識的社會面向，也就是說，科學家個人往往會受到階級利益、政治權力、或是其他社會因素左右 (SEP, 2006a)。不過，儘管知識社會學與社會知識學有共同的關懷，兩者還是有點不同，也就是後者對於規範性的執著 (SEP, 2006b)。

<sup>9</sup> 譬如說，學界是如何透過呼群結黨、相互標榜來獲得地位。

之，除了個人式古典社會知識論，其他三種社會知識論都強調社會差異對於知識生產的影響，都可以算是廣義的社會知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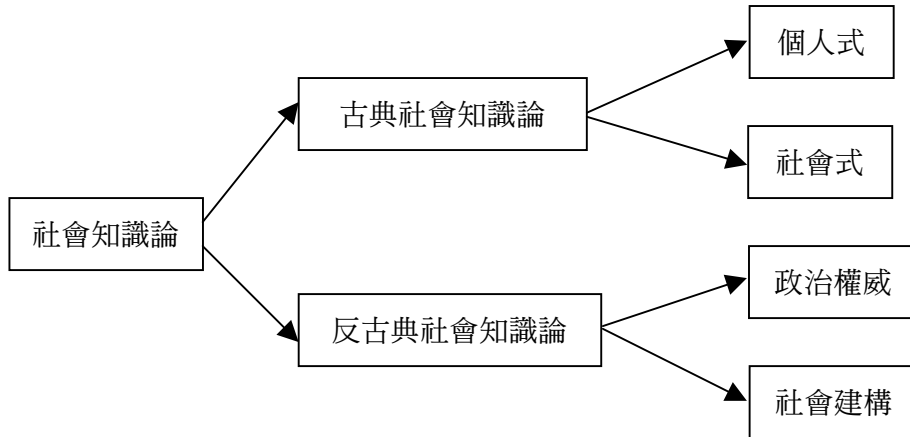


圖 2：社會知識論的類別

整體來看，社會知識論的基礎是社會因素會影響我們的認知。在這裡，所謂的「社會」，並非止於經濟利益或是政治權力，而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可能的關係<sup>10</sup>。從宏觀的分析途徑來看，社會知識論所重視的知識主體 (epistemic subject) 是社群／團體／集體，包括種族、性別、或是族群；她們／他們主張社會關係會扭曲認知及知識，因此認為沒有所謂的普世理性原則。譬如女性知識論者相信<sup>11</sup>，由於科學社群在組織上的性別分工，在這樣具有偏見的脈絡下生產出來的知識，所反映的就是權力關係的分配。相對之下，如果從微觀的研究角度來看，社會知識論想要考察的是特定科學研究社群內部如何取得共識。

根據「立場理論」(standpoint theory)，一個人所處的「社會場域」(social location) 會左右其經驗 (圖 3, a)，進而影響其觀點 (b)，最後，決定其「知識論場域」(epistemic position) (c)。這裡所告訴我們的，並非單純的心理機制而已，也就是因為經驗不同而導致觀點不同 (b)，還要

<sup>10</sup> 這部份整理自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EP, 2006c)。

<sup>11</sup> 不過，並非所有女性知識論者都採取社會知識論。這部份整理自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EP, 2006b)。

強調，經驗上的差異並非隨機所致，而是因為所處的社會場域不同，在不知不覺中就被社會結構有系統地約制 (a)。不過，我們還必須進一步釐清由觀點不同到知識差異 (c) 的機制，特別是制度因素的介入 (d)。譬如說，表面上看來是中性的知識生產機構，有可能被某些具有特定觀點的一群人所支配 (e)；甚至於，立足點早就直接決定了各種社會制度的分配 (f)，根本不必輾轉經過心理層面的經驗、或是觀點 (a、b) 來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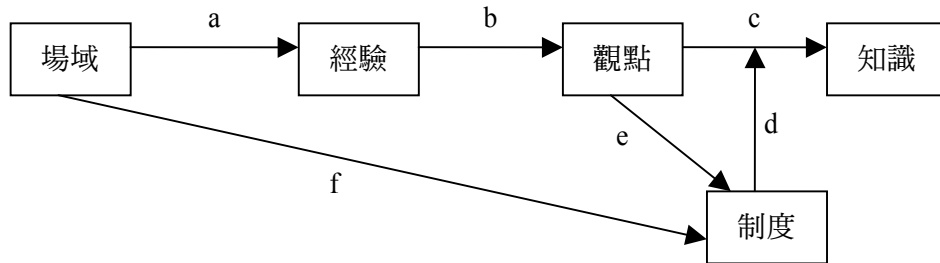


圖 3：社會場域與知識的取得

然而，不管是心理 (a、b)、或是政治 (f) 路徑，光是社會結構無法解釋為何要控制知識的生產，除非我們能了解心理、政治、以及社會因素背後的文化認同差異，否則，就要落入社會決定論的陷阱。

## 貳、由群體中心主義到彩繪知識論

Stanfield (1985) 提出「族群中心主義<sup>12</sup>」(ethnocentrism) 來解釋文化<sup>13</sup> 如何影響知識的生產。他承續社會知識論的基本想法，也就是社會環境左右人的認知風格，而群體有各自不同的經驗、優先順序、及理念 (p. 400)，不過，他還進一步主張，認為人類的建構避免不了受到深層的文化

<sup>12</sup> 按照字面來翻譯，「族群自我中心主義」並沒有錯，然而，Stanfield (1985: 393) 把這個名詞作廣義的解釋，還擴及種族、性別、機構、社群、以及社會，因此，實際上較為看，「群體自我中心主義」會比較恰當。

<sup>13</sup> 在這裡，文化包含情感認知、規範標準、維生模式、溝通方式、科技、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理念 (Stanfield, 1985: 388)。

基礎影響；也就是說，族群中心主義並非建立在原生的群體特質，而是族群的文化思想控制。具體而言，知識的生產是受到族群中心主義所左右，特別是經過制度化、被國家權力結構吸納的社會科學（p. 409）：社會上一群具有特權的人（privileged subset of the population）（p. 389），透過國家機器的控制，尤其是媒體、教育機構、以及知識生產機構，讓被支配者產生自卑感，造成知識的階層化，也就是上尊下卑的族群分工。

原本，族群中心主義有凝聚族群、自我激勵的正面功能，可以動員組織來對抗外部的威脅，然而，當它被拿來對付他者，卻變成邪惡的支配工具，讓對方感到自卑；當一群人對於本身的集體認同失去信心，就只能仰賴別人來定義自我文化（Stanfield, 1985: 393）。基本上，支配關係形塑了被支配者的認知方式、思考過程、以及對於現實的詮釋（p. 400）。為了削弱被支配者的集體意識及尊嚴，支配者硬是把一套意識型態加在對方身上，並透過實際的作為，想辦法讓對方委曲求全調整自己的思想及行為來配合本身的利益。因此，即使被支配者終於取得足以匹敵的技能，在主人的面前，還是必須刻意戴上順從的面具；相對地，對於支配者而言，即使是處於社會經濟地位的最底層者，還是自認為比被支配者還要優秀（p. 395）。

其實，族群的看法或許有不同，然而，並沒有優劣之別。因此，支配者並非在思想上高人一等，而是他們壟斷基本資源及機構，特別是知識的生產及分配（Stanfield, 1985: 396-97）。支配者為了要合理化不公平的資源及地位分配，必須對被支配者進行社會化，特別是透過說書人或是歷史學者來彰顯族群的輝煌過去，藉著媒體及學校來洗腦，並不斷地以節慶來形塑傳統，以張揚自己獨特的優越性（p. 394）。在這個過程，被支配者的語言、文化、或是行為，要不是被視為奇風異俗而消費、就是貶抑為病態現象而鄙夷，而膽敢出面點破國王新衣者，當然要被打為麻煩製造者、情緒化的人、瘋子、或是被支配者內部的邊緣份子（pp. 400-401）。

Gordon 等人（1990）提出「群體<sup>14</sup> 中心乖離」（communicentric bias）

<sup>14</sup> 這裡的群體包含男性（androcentric）、文化（culturocentric）、或是族群（ethnocentric）的沙文主義（Gordon, et al., 1990: 15）。

的概念，用來解釋時下社會科學知識論的偏差：他們認為，政治、經濟、及社會結構所組成的脈絡，會把特定群體的想法拿來當作整個社會的共同思考架構，進而形塑、甚至於限制我們的思想及知識生產；也就是說，由於被支配族群的參與不足，觀點不是被忽視、限制、扭曲、或截斷，甚至於視為有缺陷，因此，所生產出的知識是有侷限性的。他們指出，這種知識論並非刻意針對被支配的群體，而是文化霸權限制了研究的視野。

同樣地，Scheurich 與 Young (1997) 提出「知識論種族主義」(epistemic racism) 的概念，說明支配者的歷史文化塑造知識論，進而強化現有的支配關係。相較於個人的、制度性的、或是社會上的種族主義，知識上的種族主義是無影無形的，傷害人而不自知，因此也是最糟糕的種族主義形式 (p. 12)。由於支配者往往對於被支配者的知識論認為是不入流的、或者視而不見，因此，面對充滿敵意的主流研究社群，被支配者的學者為了要生存，必須花很多的時間精力去證明自己，特別是被迫披上對方的知識論外衣，如果僥倖搭上線而不被排除，才能經過實力、勇氣、及毅力，擺脫種族的偏見、及知識的倚賴 (pp. 9-10)。

Scheurich 與 Young (1997) 提出「彩繪知識論」(coloring epistemology) 的概念來對抗知識論種族主義，也就是從多元文化主義著手，強調種族、性別、或族群等社會文化差異，主張建構具有文化敏銳度的知識論，以新的思維來從事研究。他們認為讓被支配者應該成為研究的主體 (subject)，要以自己的知識論來研究自己，不再老是被別人 (學者、他者) 所研究的客體 (object)。他們又建議，雙方除了應該進行轟轟烈烈的對話及辯論，主流社會的學者更是必須正視少數族群的知識論，包括鼓勵學生使用族人的觀點來從事學位論文寫作、將少數族群學者的研究成果列入參考書單、接受他們的學術刊物、甚至於邀請他們擔任主流學術期刊的客座編輯 (p. 11)。

類似的建議有 Gordon (1990) 的 African-American epistemology、Bernal (1998, 2002) 的 Chicana feminist epistemology 與 critical raced-centered epistemology、Dillard (2000) 的 endarkened feminist epistemology、以及 Ladson-Billings (2000) 的「族群知識論」(ethnic epistemology)。雖然她



／他們未必都主張族群／群體之間的知識安排都是階層化的，不過，至少都同意社會文化的差異對於知識生產的影響，同時主張以多元的知識論來進行研究，來達成思想的解放、及行動的賦權。

總之，支配與知識是一個相互建構的社會控制機制：一方面，族群中心主義是用來製造知識的階層化，另一方面，知識的宰制又回頭強化族群中心主義；因此，唯有被支配者拒絕臣服，才有可能打破惡性循環(Stanfield, 1985: 395-96)。Gordon 等人(1990: 14, 17)指出被支配者的責任，也就是說，由於受害者本身往往未能積極解決困境，自己反而在不知不覺中被吸納而淪為幫兇。因此，儘管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於徒勞無功，然而，批判是必要的努力，唯有不斷地提出駁斥、擴充洞察力、以及揭穿假面具，才能透過多元的知識論來獲致有創意的知識生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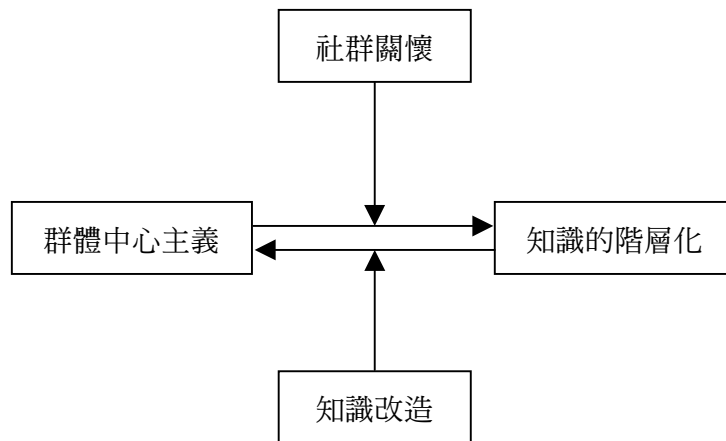


圖 4：群體與知識的相互建構及學者的角色

Wright (2003: 202) 也認為，被支配群體的研究者必須了解自己有雙重的責任，一方面對抗種族主義，另一方面挑戰知識支配：首先，身為群體的成員，必須對於共同體的命運進行反思、付出關懷、採取行動，再來，作為研究社群的一員，有義務對於現有的研究典範、科學建制、或是知識霸權展開介入，積極在知識論的高度從事改造的工作；前者是政治性的奮鬥，而後者則是實利的努力(圖 4)。也就是說，既然與現有的研究典範格

格不入，被支配群體的研究者與其削足適履、逆來順受（p. 203），不如發揮原本被自己拿來當生存法寶、卻被訕笑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或「意識分叉」（bifurcation of consciousness）（pp. 208-209），勇敢地批判現有的論述、並另起爐灶來擘劃自己的知識論。

### 參、原住民族知識體系

巴蘇亞·博伊哲努（2005：8）將原住民族知識定義為「生物及文化多樣性」：

面對擁有各樣地質地形的台灣土地，原住民族分別發展出刀耕火墾輪作、採集、狩獵、漁撈的運用方式，從而衍生出龐雜的土地共處倫理，對於高山、深谷、河川、海洋以及樹木、花草與棲息其間的鳥獸蟲魚之類，亦都有其複雜的對待態度與深層的宗教、哲學構想。由於這樣的倫理與構想，以及具體的實踐，……

他強調原住民族知識的記錄、分析、及統整，透過集體知識的回溯及詮釋，從新啟用族人傳統的經驗及知識，「禮失求諸野」，因此，所謂的原住民族知識，就是原住民族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pp. 6-8）。

應該是受到客家知識體系的論述影響，從 2000 年代開始，原住民族的知識份子也比較有系統注意到這個課題。在台灣原住民族教授學會的主導下，由當時任教於佛光大學哲學系的張培倫（2008）規劃，向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提起「建構台灣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研究計畫，於 2008-2009 年透過工作坊及學術研討會來進行探索的工作<sup>15</sup>。接著，考試院在 2010 舉辦「國家考試與原住民族知識學術研討會」（12 月 21 日），希望能透過國家考試加以推廣。另外，台灣師範大學原住民族發展中心在汪明輝的領導

<sup>15</sup> 該計畫的共同主持人是蔡中涵、及汪明輝。共舉辦四場工作坊，見台灣原住民族教授學會（2008）。研討會與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合作，於 2009 年 5 月 15-16 日舉辦「第一屆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研討會」，發表 15 篇論文（楊曉珞，2009）。部份論文於會後刊於《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5-6 期，包括施正鋒與吳珮瑛（2009）、張培倫（2009）、林福岳（2009）、郭祐慈（2009）、夏曼·藍波安（2009）、陳毅峰（2009）、楊曉珞與雅柏甦詠·博伊哲努（2009）。

下，從 2008 年秋天開始舉辦「原無疆界知識座談會」，嘗試著從不同面向來探討原住民族的知識。再來，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也在 2010 年舉辦「原住民族研究學術研討會」（4 月 24 日），探討美澳紐加等國的原住民族研究的發展及現況（施正鋒，2010），來自加拿大的主題演講者 Frank Tough（1990）特別以「倡議事研究」（advocacy research）相勉。圖書館學界針對原住民族研究的主题，也嘗試著進行原住民族知識的分類<sup>16</sup>。

最具有企圖心的是張培倫（2008、2009）。他首先指出重建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三個背景：原住民族自主性提高、民族教育體制的迫切性、以及生存世界的急速變遷。關注的課題包括方法論、知識論、以及系統論。基本上，他把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建構視為解殖民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說，除了彌補主流社會知識體系的不足，還要透過原住民族的知識主體性來重構原住民族的認同，並達成權力及資源分配的平等。再來，他指出原住民族知識獨特的整體性（holistic）世界觀、以及作為核心範疇知識的原住民族哲學。最後，他想像原住民族知識變化的可能途徑。他隨後把這些想法用來檢驗目前的原住民族教育（陳張培倫，2010）。

張培倫（2010：37-38）同意 Sidney Stephen，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體系與主流社會的知識體系是有交集（Barnhardt, 2005: 16, Fig. 1）。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受到 Linda Tuhiwai Smith（1999: 117, Fig. 6.1）的原住民族研究議程影響（張培倫，2008：圖 1），也就是原住民族的研究是以生存、復原、發展、以及自決為目標，沿著解殖、癒合、改造、以及動員等四個方向在努力。然而，由於該計畫並未獲得延續，暫時看不出要如何作出跨越十四族的整合（圖 5）（張培倫，2008：圖 2）。汪明輝（2009：圖 1）在從事鄒族傳統領域資源管理知識研究之際，將知識分為社會性、歷史性、以及空間性三類，嘗試以三度空間的方式，初步勾勒出鄒族知識體系的架構，圖像更為明晰（圖 6）。

<sup>16</sup> 譬如陳雪華（2010）、陳雪華與朱雅琦（2009）、以及朱雅琦與陳雪華（2010）。另外，行政院也有施政分類的架構（Categorized Administrative Knowledge Entity, CAKE）（行政院秘書處，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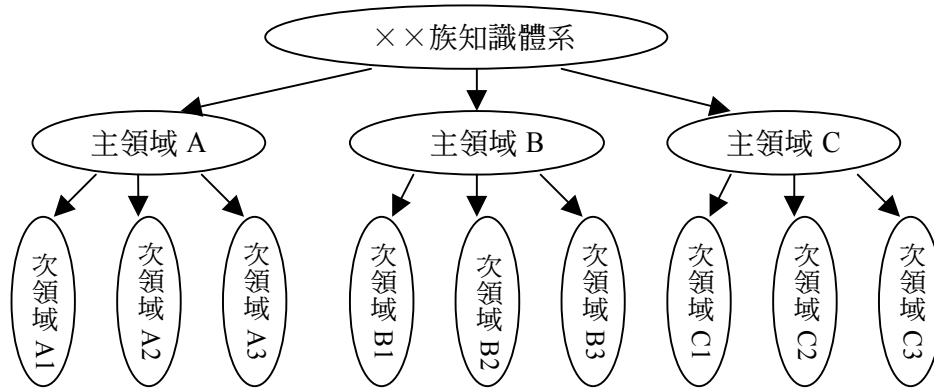


圖 5：原住民族知識體系分類表範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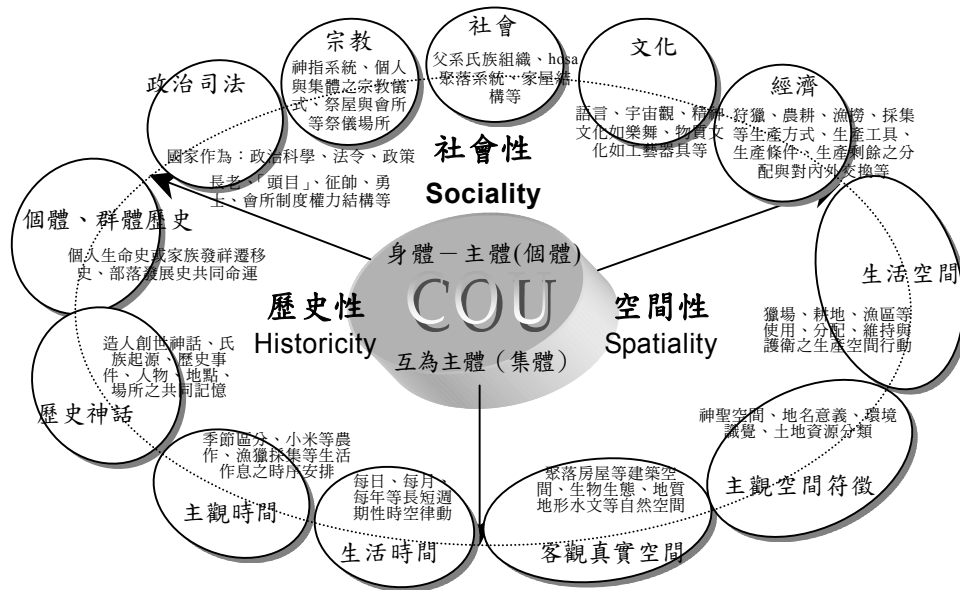


圖 6：鄒族存有及知識本體架構

### 肆、客家知識體系

徐正光與張維安(2007)把客家研究的發展分為三階段：1988年之前的隱形人、客家運動中的族群建構、以及客家知識體系的追求。首先，根據他們的觀察，早期對於客家族群的研究，若非迎合「漢人在台灣移墾」

的政治正確、再不就是當作了解中國的替代性工具，一直要到 1980 年代末期，客家還我母語運動出現，客籍學者積極投入關懷，啟動客家研究的發軔。在第二階段的論述，一方面是透過歷史的詮釋，來重建客家族群的集體記憶，另一方面則專注文化象徵的建構，尤其是語言、宗教、文學、音樂、及戲曲的研究<sup>17</sup>。當前，客家研究的特色在於如何制度化，特別是以大學為中心的研究<sup>18</sup>，研究的重點包括客家族群性與族群意識的發展、民主化／本土化的參與、國家政策的影響、以及族群互動。台灣客家研究學會在 2004 年成立，更進一步自我期許要把「客家研究」(Hakka Studies) 往上提升為「客家學」(Hakkaology) 的境界；《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徐正光, 2007)、《客家族群與在地社會——台灣與全球的經驗》(丘昌泰、蕭新煌, 2007)、以及《多元族群與客家——台灣客家運動 20 年》(莊英章, 2008) 的出版，意味著第三階段的初步成果驗收。

徐正光與張維安(2007: 1) 指出，在研究當中有客家變項，並非就是客家研究，關鍵在於「有沒有客家主體意識」。他們主張，要由客家研究進入客家學，在於研究社群是否具有共同的典範，包括獨特的研究對象、知識的性質、以及學者的社會角色；所謂的知識性，他們提出經驗性、詮釋性、以及規範性等三大構成要素(頁 10-11)，也就是 Habermas 所提的技術性、實踐性、以及解放性等三種知識(IHMC CmapTools, n.d.; 見附錄 1)。他們特別指出客家學「反思性、批判性」的背景(頁 13)：

<sup>17</sup> 如果我們不論羅香林(1992/1933)在戰前出版的《客家研究導論》，在 1990 年代初期，徐正光在所編纂的《徘徊於族群漢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1991)、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所出版的《新个客家人》(1991)、以及《台灣客家人新論》(1993)，代表社會運動界與學術界攜手合作客家研究的初試啼聲，當時，陳運棟(1991)就初步提出客家學研究的意涵。由中研院民族所的徐正光所編的四大冊《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在 2000 出版，顯現出國內外研究者的加持。進入二十一世紀，由鍾肇政擔任總召集人、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出版的《台灣客家族群史》(台灣客家族群史)各篇相繼出爐，包括總論、產經、語言、民俗、移墾、社會、政治、學藝，表示客家研究已經獲得國家的正視。

<sup>18</sup>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以及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從 2003 年起陸續招生，象徵著客家研究的制度化，特別是舉辦「全國客家學術研討會」、以及「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

不論是在羅香林時代或當前的台灣社會，客家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視，和一個社會的不合理發展具有密切的關係，不論是為了正名客家族群為漢人，或者是要爭取客家話的發聲權，都是因為客家族群感受到在社會中受到扭曲與壓迫。所以打從一開始，客家學的發展和客家社會運動具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反省、思考一個合理的社會的建構，推動多元族群文化社會的理想，一直和客家學的發展有密切的關連。

也就是說，客家學的發生與實證的、詮釋的社會科學傳統，固然有相當的關連性，但是客家族群所處的時代的不公平、不正義以及扭曲的公共資源的分配與不合理的族群關係，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特別是在一個以市場導向為思考根據的社會裡，族群資源的分配經常以市場的邏輯為根據。

張維安（2004）認為客家研究是一個科際整合的領域，立基於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以及語言學（圖7）。林修澈（1994：8-9）主張民族及文化是客家學的核心，這是民族史及民族誌的課題，而客家人的定位是根本，因此民族學／民族理論是基礎，至於民族發展則交給其他學科去發揮（圖8）。

成立於2001年的行政院客家委員會<sup>19</sup>，持續委託研究、以及獎助優良碩博士論文，也有相當的主導功能。特別是『客家基本法』（2010）明定「政府應積極獎勵客家學術研究，鼓勵大學校院設立客家學術相關院、系、所與學位學程，發展及厚植客家知識體系」，客委會提出「台灣客家知識體系深耕計畫」三年計畫程，希望達成「形塑優質客家學術研究環境，提升客家研究品質，建構客家知識體系完整論述，奠定『客家學』在台灣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學術地位」等目標，委託學者進行「建構『客家知識體系』規劃研究」、「六堆客家研究」、以及「客家區域整合型研究」（客家委員會，2012、2012）。

<sup>19</sup> 其實，在徐正光擔任客委會籌備處主任之際，便把客家知識體系當作客家論述的基礎；日後，客委會更成立「客家學術發展委員會」（徐正光與張維安，20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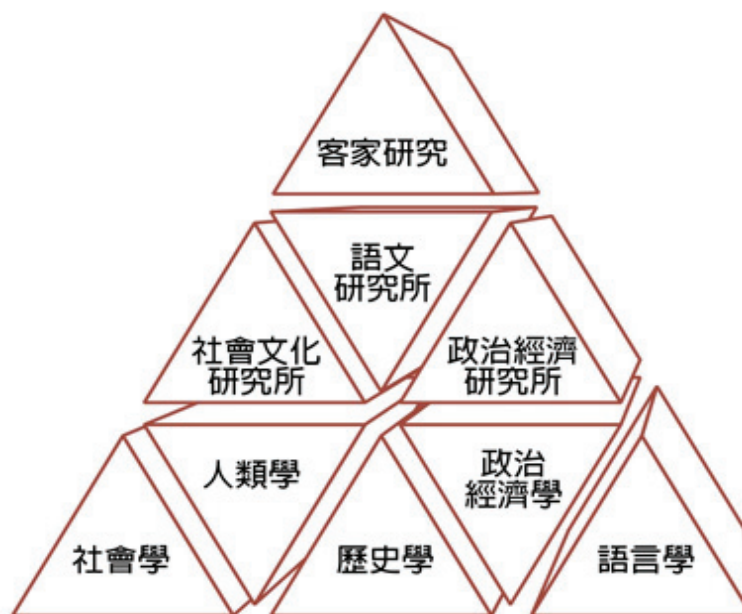


圖 7：客家研究以社會科學相關學科為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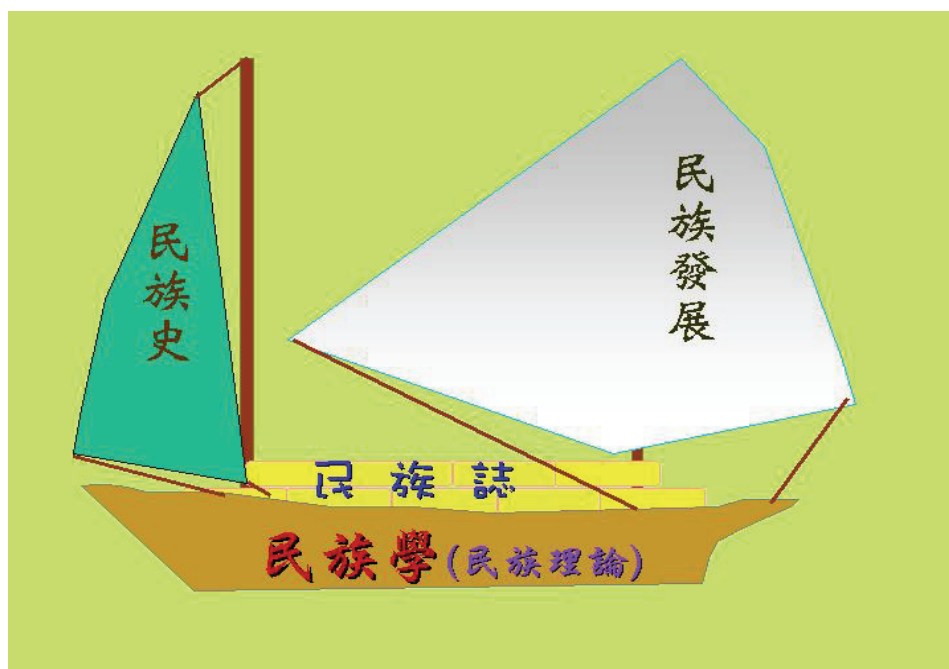


圖 8：客家學的學科體系

由客家研究的萌芽、客家學的成長、到客家知識體系的茁壯，目前正尋覓學術領域的成熟。由江明修(2012)所領銜的《建構「客家知識體系」規劃研究》團隊，在短短的半年期間，除了調查過去二十年來的客家研究社群及其成果、並加以分類，探究當前再制度面的困境，檢討現有的獎助機制，還提出未來六年的發展政策建議，更重要的是嘗試勾勒客家知識體系的分析架構及理論基礎。

江明修等人(2012)將客家知識體系分為經驗、行動、以及理論三個部分<sup>20</sup>；他們認為，過去二十年來的客家研究著重於前二場域，未來應該強化理論基礎(頁總3)。至於要如何來建構客家知識體系，他們的看法是以客委會當作火車頭，來推動學術機構及文史工作者的研究，因此，花了相當的工夫在檢討現有的獎勵機制。他們根據國科會的十二個學門，將客家知識分為教育法制、社會經濟、以及語言文化，大體符合客家關心的課題、以及客家學院的建制；如果以他們所呈現的「客家知識體系概念圖」來看(頁總3，圖1)，八個關注的領域雖有連結、卻沒有交集，由於沒有明顯的環環相扣，令人擔心是否會因而零碎化。或許是羞澀，他們並未描述客家知識的生產組織、以及社會結構的病理分析，那麼，難免讓人質疑「核心價值及定位亟待釐清」的藥方何從而來(頁總61)。

## 伍、我們的摸索

究竟客家研究要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專業領域<sup>21</sup>？我們認為：

「客家研究」應該是「以客家為中心」(Hakka-centered、或是Hakkacentric)的學科，也就是強調以客家的觀點，來呈現客家形象、

<sup>20</sup> 不過，由頁1-10的圖來看，他們好像認為客家知識體系不包含行動的部份。另外，所謂的理論，到底是要解釋客家現象、還是客家知識體系的產生，並不清楚，因此，很難判斷其適用。

<sup>21</sup> 如果以專業的角度來看，每個學術領域對於成員都有自己不同的專業要求，除了起碼的專業倫理、社會責任、以及研究能力以外(Goodin & Klingemann, 1996: 6)，還要包括彼此有共同的基本立場、關鍵概念、核心課題、主要理論、研究方法、以及重大挑戰(Karenga, 1993: xv; Anderson, 1990: 2)。



以及詮釋客家經驗；同時，我們希望以批判的態度，除了要糾正歷史殘餘的負面刻板印象，還要在了解自我的過程中，嘗試著去正面型塑客家人的認同；最後，我們希望能挖掘、推敲出客家族群所企盼的意識形態（或是理念），以保障客家族群的群體權利（group rights）、以及推動客家人的集體福祉。

我們當時被要求以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客家研究<sup>22</sup>（施正鋒，2004）：

從知識論（epistemology）的角度來看，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如果要能稱得上是科學的話，應該有三項任務：診斷、醫療、以及預防；也就是說，族群政治的學者應該像醫生一樣，必須先能正確地描述族群現象，再來是提出合理的解釋，然後才能提出有效的化解族群齟齬之道，以便達到避免族群衝突的目標。如果我們服膺「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價值觀的話，下面是政治學者必須處理的課題。

在概念上而言（conceptually）我們必須先解答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客家人是否為「族群」（ethnic group）。再來，我們應該尋求「客家人」的定義為何，也就是說，就客家族群的集體想像當中，作為一個客家人，應該在客觀上、以及／或是客觀上有哪些條件？是共同的血緣、語言、文化、還是經驗／記憶／歷史？再來，客家人的個人認同、「學理上／民族學」的辨識、以及法律上的身份，三者是否有區別？這些是否有政治哲學上有關權利的意義？回答了上述問題，我們才可以問，到底客家族群的人口數有多少？是否應該在人口普查的結果呈現出來？應該是由當事人填寫自己的族群認同、還是由官方來認定？個人的族群認同是否應該公佈（譬如戶口名簿、還是身分證件）、還是作為整體施政的參考用即可（譬如財源的分配）？

在實證上（empirically），我們必須考察客家族群在政治權力、經濟資源、文化價值、以及社會地位上的分布為何，尤其是客家人物資料庫的建立刻不容緩。在這裡，除了客家族群菁英與百姓的認知以外，如果有可能建立相對客觀上的具體指標，是否具有額外的意義？在上述政治（行政、立法、司法、或是考試）、經濟、文化／語言、

<sup>22</sup> 請參考丘昌泰（n.d.）、莊英章（2004）、以及楊國鑫（2009）。

或是社會場域的分配，彼此是相互強化、還是有相互切割而弱化的傾向？它們又與城鄉差距是否有關聯？統治者的政策扮演何種角色（推波助瀾、還是戒慎規避）？政黨的立場（追求、忽視、或是排斥）又有何種影響？客家菁英自來採取何種應對的態度（積極、或是消極）、或是策略（合縱連橫、或是孤立自保）？客家族群的政黨認同、民族認同、以及國家定位與其他族群是否有別？客家族群在歷史上與其他族群互動的模式為何（圖2）？台灣的客家族群與其他地方講客家話的人士（中國、南洋、或是其他地區），其跨越國界的關係為何（政治、經濟、或是文化）？由台灣移民他國的客家人，其國家認同與國內的客家人是否有所差異？

在理論上（theoretically），我們必須解釋客家認同是如何產生的、如何由文化集團凝聚為客家族群？客家運動（還我母語、族群公平）是如何來動員的？在這裡，可供我們選擇的理論有「原生論／本質論」（primordialism/essentialism）、「結構論／工具論」（structuralism/instrumentalism）、以及「建構論」（constructualism），那麼，在不同的階段裡，我們是否採取不同的理論來解釋？它們是否相互排斥，還是可以作某種程度的合成（synthesis）？譬如說，表面上是以原生論作辨識的基礎、並且以結構論作動員的訴求，客家族群實際上是在進行 Benedict Anderson 式的集體認同建構。就本體論而言（ontologically），作為個體（agent）的客家族群，究竟與結構（包含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的關係為何，特別是國家機器（朝廷、殖民者、政府）？是試圖擺脫結／駕馭、命定接受制約、還是相互調適？更重要的是，這些應該立足在何種概念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來分析？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墾殖社會（settlers' society），或是被征服的原住民土地，還是移民（immigrant）所構成的國度？

由於我們擔心客家研究很可能出現各行其是的孤島情形（圖9），主張這應該是聚焦的「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研究，也就是把客家研究當作「學術領域」（academic discipline）來看待，至於其他領域只能算是研究者的「專長」（specialty）（施正鋒，2007：6-8）（圖10）。我們針對原住民族研究，進一步提出「超領域」（transdisciplinary）的族群研究看法（圖11）（施正鋒，2011a：圖4），希望研究對象應該有所交集，由盲人摸象、拼圖式的合作、到共襄盛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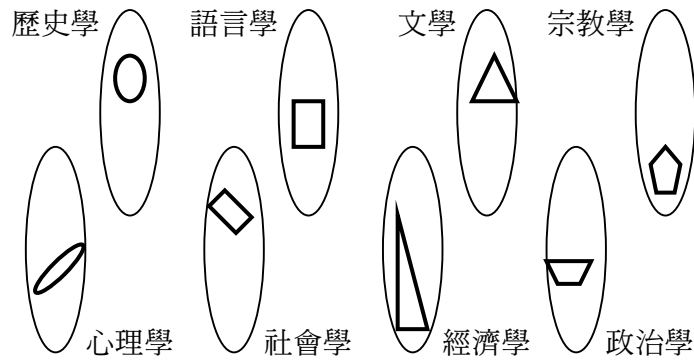


圖 9：孤島式的客家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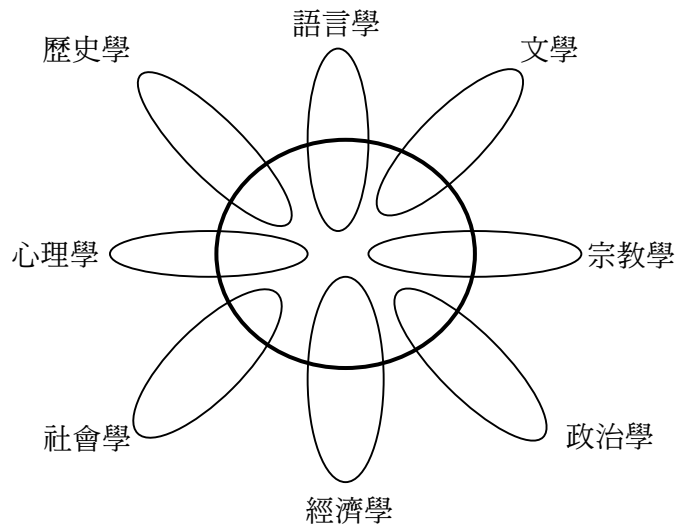


圖 10：跨領域的客家研究

針對客家研究，我們由學術領域、教育機構（行政組織、以及師資聘任）、以及社會服務三方面來切入（施正鋒，2007），進而運用到分析原住民族研究。在研究定位上，我們認為（施正鋒，2011a）：

宏觀來看，大學教育的任務不外乎研究、教學、以及服務：其中，除了奢侈的「為了研究而研究」，也就是所謂的「純研究」，專業研究還要提供教學、以及服務所必須的學術基礎。至於教學，並非侷限於知識的傳遞，還包含對學生進行啟蒙的工作、以及對族人提供

賦權（empowerment）的契機。同樣地，就服務而言，不只限於對國家提供政策建議，還要能幫助社會改造、促進社會和諧／和解，尤其是對於少數族群的權利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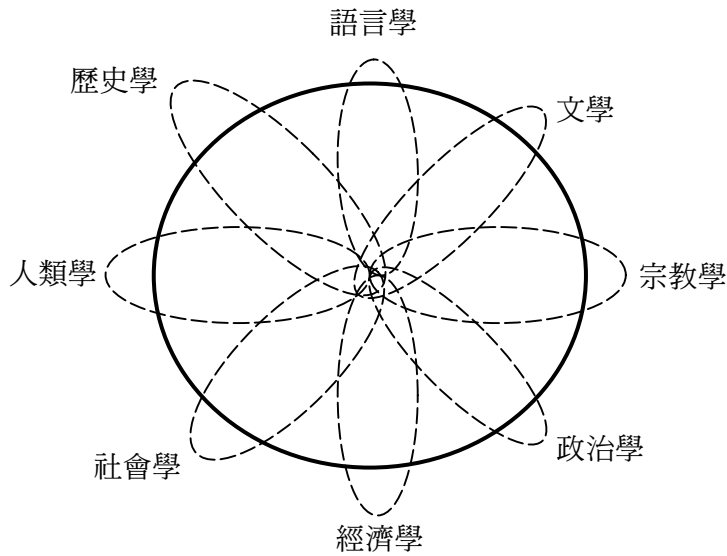


圖 11：超領域的族群研究

## 陸、結語

我們主張族群研究的目標有族群個體、族群關係、以及族群與國家的關係等三個面向；具體而言，就是族群自我認同的建構、與其他族群進行合理的互動、以及尋求與國家的合理定位。換句話說，族群研究並不是狹隘地限定在對於族群本身的探究而已，研究的對象應該還要包含族群與族群之間的關係、以及族群與國家的關係（施正鋒，2011a）：

首先，為了要完整地（holistic）紀錄某族群的過去經驗、呈現現在的狀況、以及描繪未來的願景，族群研究當然要針對該族群的知識（價值、哲學、世界觀）、歷史（記憶）、文化（語言、宗教、文學、藝術、習俗、生活方式）、制度（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心理（尊嚴），做通盤的認識。基本上，族群研究是以族群自己的觀點為中心，來詮釋本身的經驗、並重新呈現自我。

接著，族群研究除了關心族群的自我定義，還要嘗試著去了解該族群與其他族群的接觸，特別是與最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如何維持相當程度的族群界線。具體而言，族群研究必須要探討，在一個國家的族群結構中，該族群的權力關係為何？可以獨善其身、順服、還是支配？在合縱連橫的過程中，到底要視議題做權宜性的合作、漢賊不兩立、扮演忠誠的盟友、還是仲裁者的角色？如果要選擇結盟，是要限定在菁英、群眾、還是不分層級？究竟在不同的部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必須採取一致性的策略、還是可以選擇性地切割？

最後，族群研究更要關心族群與國家的定位。譬如說，到底國家是支配性族群控制其他族群的工具、捍衛遊戲規則的中立裁判、還是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個體？國家應該積極介入族群關係、還是順其自然就好？對於族群差異，到底是要採取色盲的態度、正式承認、還是制度化？對於族群分歧，希望隨時間逐漸消逝、還是正面看待？只要消極地反歧視就好、還是要積極地保障少數族群的權利？對於過去的族群衝突，究竟要採取遺忘、淡化、還是化解？更基本的是，這是單一文化、雙文化、還是多元文化的國家？

我們點出原住民族在教學、研究、以及服務方面的挑戰（施正鋒，2011a）。首先，要脫離點綴的出發點，必須重新思考當初設置這些機構的初衷；我們特別指出，在教育部、原民會、及學校相互推諉的情況下，爹不疼、娘不愛、孤兒院長嫌賠錢，多元文化主義淪為口號、原住民族教育遙遙無期（施正鋒，2011b）。有關於知識累積，還是要回到到底要用甚麼指標來衡量自己，要如何讓已經入行的人獲得公平的學術待遇：

面對習慣圈地捍衛學術地盤的傳統領域，我們不甘於永遠當 C 咖，就必須開創新的公共空間，讓圈內的學者有相互切磋的場域。為了防止被打壓、支配、敵視、歧視、邊緣化、瑣碎化、視為雞肋、敷衍、攏絡、或是吸納，我們可以立即努力的工作，包括專業學會、年度研討會、以及學術期刊，以免年輕的原住民族研究學者四處尋覓發表成果的園地，沉淪為 O'Brien（2003: 692-93）口中的「意外的遊客」（accidental tourist），或是為了提高論文雀屏中選的機率，想辦法掩飾自己的原住民族風味。

如果我們服膺「知識就是權力」的老生常談，那麼，不管是在國際、還是國內的場域，知識當然可以被當作支配（domination）、控制（control）、甚至於壓迫（oppression）的工具，特別是有上下位階關係的知識分配（施正鋒、吳珮瑛，2009）。我們做如下的期許：

由於原住民學者、或是原住民族研究學者的社會關懷天職，難免會被質疑是否把「社會運動者」（activist）的角色隱藏起來、假裝自己是學術圈的人，也就是「政治化」、或是「不夠客觀」的指控。……。就像一名醫生，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家，豈可在做完成診斷、並做病理分析以後，仍然頑固地拒絕開藥方？難不成，本身對於藥理是一竅不通？難道，對於原住民族迫切關心的議題，學者就不可以有任  
何社會責任嗎？

## 參考文獻

- Anderson, Talmadge. 1990. "Black Studies: Overview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Talmadge Anderson, ed. *Black Studies: Theory, Method,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pp. 1-10. Pullman, Wash.: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Barnhardt, Ray. 2005.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 and Alaska Native Ways of Knowing."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36, No. 1, pp. 8-23.
- Bernal, Dolores Delgado. 1998. "Using a Chicana Feminist Epistemolog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Vol. 68, No. 4, pp. 555-82.
- Bernal, Dolores Delgado. 2002. "Critical Race Theory, Latino Critical Theory, and Critical Raced-Gendered Epistemologies: Recognizing Students of Color as Holders and Creators of Knowledge." *Qualitative Inquiry*, Vol. 8, No. 1, pp. 105-26.
- IHMC CmapTools. n.d. "Concept Map." ([http://cmapspublic3.ihmc.us/rid=1247634595750\\_598536694\\_14160/Knowledge%20Types%20from%20Habermas.cm.ap](http://cmapspublic3.ihmc.us/rid=1247634595750_598536694_14160/Knowledge%20Types%20from%20Habermas.cm.ap)) (2012/9/30)
- Dillard, Cynthia B. 2000. "The Subst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Examining an Endarkened Feminist Epistemolog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Leadership."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Vol. 13, No. 6, pp. 661-81.
- Du Bois, W. E. B. 2007.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in *Three African-American Classics*, pp. 159-331.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 Goldman, Alvin I. 2010. "Why Social Epistemology Is Real Epistemology," in Adrian Haddock, Alan Millar, and Duncan Pritchard, eds. *Social Epistemology*, pp. 1-2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odin, Robert E.,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1996. "Political Science: The Discipline," in 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pp. 3-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rdon, Beverly M. 1990. "The Necessity of African-American Epistemology for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172, No. 3, pp. 88-106.
- Gordon, Edmond W., Fayneese Miller, and David Rollock. 1990. "Coping with Communicentric Bias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 19, No. 3, pp. 14-19.
- Holzner, Burkart, and John H. Mark. 1979. *Knowledge Application: The Knowledge System in Society*. Boston: Allyn & Bacon.
- Karenga, Maulana. 1993. *Introduction to Black Studies*. Los Angel: University of

Sankore Press.

- Ladson-Billings, Gloria. 2000. "Racialized Discourses and Ethnic Epistemologies," in Norman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sup>nd</sup> ed. pp. 257-77.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Moser, Paul K., Dwayne H. Mulder, and J. D. Trout. 1998.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A Thematic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Brien, Jean M. 2003. "Why Here? Scholarly Locations for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American Quarterly*, Vol. 55, No. 4, pp. 689-96.
- Scheurich, James Joseph, and Michelle D. Young. 1997. "Coloring Epistemologies: Are Our Research Epistemologies Racially Biased?"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 26, No. 4, pp. 4-16.
- Smith, Linda Tuhiwai. 1999.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London: Zed Books.
- Stanfield, John H. 1985. "The Ethnocentric Basis of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Production."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Vol. 12, pp. 387-415.
-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EP). 2006a. "Social Epistemology."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epistemology-social/>) (2012/9/30)
-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EP). 2006b. "Feminist Social Epistemology."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feminist-social-epistemology/>) (2012/9/30)
-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EP). 2006c.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scientific-knowledge-social/>) (2012/9/30)
- Tough, Frank. 1990. "Introduction: Advocacy Research and Native Studies." *Native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2, pp. 5-12.
- Wikipedia. 2012. "Epistemology." (<http://en.wikipedia.org/wiki/Epistemology>) (2012/9/30)
- Wright, Handel Kashhope. 2003. "An Endarkened Feminist Epistemology? Identity, Differ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Vol. 16, No. 2, pp. 197-214.
- 巴蘇亞·博伊哲努, 2005。《從部落出發—思考原住民族的未來》。台北：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翰蘆)。
- 丘昌泰, n.d.。〈從「科學」與「學科」析論「客家學」的建構〉(<http://140.115.170.1/Hakkacollege/big5/network/paper/paper25/40.html>) (2012/9/29)。
- 丘昌泰、蕭新煌(編), 2007《客家族群與在地社會—台灣與全球的經驗》。台



- 北：中大出版中心。
-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編），1991。《新个客家人》。台北：台原。
-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編），1993。《台灣客家人新論》。台北：台原。
- 台灣原住民族教授學會，2008。〈歷年活動〉（<http://www.tips.url.tw/history/tips.history.html>）（2012/9/28）。
- 朱雅琦、陳雪華，2010。〈阿美族物質文化知識組織架構之建制〉《圖書資訊學研究》5卷1期，頁75-107。
- 江明修、孫煒、陳定銘、王俐容、周錦宏、李世暉，2012。《建構「客家知識體系」規劃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研究成果發表會會議手冊。台北：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辦理「建構『客家知識體系』規劃研究」勞務採購案需求規範說明書〉（<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125208&ctNode=16&mp=1>）（2012/9/29）。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2。〈客家委員會委託辦理「東部客家研究：回顧與展望」勞務採購案需求規範說明書〉（[www.hakka.gov.tw/dl.asp?fileName=2688455971.doc](http://www.hakka.gov.tw/dl.asp?fileName=2688455971.doc)）（2012/9/29）。
- 行政院秘書處（編），2008。〈行政院施政分類架構（流通版）〉（<http://www.ey.gov.tw/Upload/UserFiles/1p.pdf>）（2012/9/29）。
- 汪明輝，2009。〈台灣原住民族知識論之建構——以鄒族傳統領域資源管理知識為例〉發表於台灣原住民族教授學會、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主辦「第一屆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研討會」。壽豐，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國際會議廳，5月15-16日。
- 林修澈，2004。〈客家學研究史論——客家學的成立與發展〉發表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辦「2004客家知識論壇」。台北，國際藝術村，12月19日。
- 林福岳，2009。〈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中傳播研究的可能脈絡〉《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5期，頁55-98。
- 施正鋒，2004。〈客家研究的政治學面向〉宣讀於台灣客家研究學會成立座談會「邁向客學之路：客家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台灣大學法學院國際會議廳，2月14日（參見施正鋒，2004）。
- 施正鋒，2004。《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台北：翰蘆。
- 施正鋒，2007。〈客家研究的思考〉收於丘昌泰、蕭新煌（編）《客家族群與在地社會——台灣與全球的經驗》頁3-20。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 施正鋒（編），2010。《原住民族研究》。壽豐：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 施正鋒，2011a。〈由族群研究到原住民族研究〉《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4卷1期，頁1-37。
- 施正鋒，2011b。〈多元文化主義與原住民族教育—東華大學三年的觀察〉《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1卷4期，頁1-53。
- 施正鋒、吳珮瑛，2009。〈台灣的學術殖民主義與原住民族的知識主權〉《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5期，頁1-23。
- 夏曼·藍波安，2009。〈蘭嶼達悟族的海洋知識〉《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5期，頁125-54。
- 徐正光（編），1991。《徘徊於族群漢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台北：正中書局。
- 徐正光（編），2000。《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四冊）。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 徐正光（編），2007。《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 張培倫，2008。〈建構台灣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之規劃研究〉計劃（未刊稿）。
- 張培倫，2009。〈關於原住民族知識研究的一些反思〉《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5期，頁25-53。
- 張維安，2004。〈客家研究與客家學〉宣讀於台灣客家研究學會成立座談會「邁向客學之路：客家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台灣大學法學院國際會議廳，2月14日。
- 莊英章（編），2008。《多元族群與客家—台灣客家運動20年》。台北：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 莊英章，2004。〈邁向客家學之路：客家族群史的回顧與展望〉宣讀於台灣客家研究學會成立座談會「邁向客學之路：客家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台灣大學法學院國際會議廳，2月14日。
- 郭祐慈，2009。〈阿美族傳統農業知識〉《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5期，頁99-124。
- 陳張培倫，2010。〈原住民族教育改革與原住民族知識〉《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8期，頁1-27。
- 陳雪華，2010。〈台灣原住民族知識組織架構建構方法之探討〉《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48卷1期，頁61-86。
- 陳雪華、朱雅琦，2009。〈台灣原住民族上層知識組織架構之建制〉《大學圖書館》13卷2期，頁1-23。
- 陳運棟，1991。〈客家學研究導論〉收於徐正光（編）《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頁10-15。台北：正中書局。
- 陳毅峰，2009。〈原住民族傳統知識體系及生態空間保護區策略〉《台灣原住民研

究論叢》6期，頁1-26。

楊國鑫，2009。〈客家學的定義的芻議〉《新竹文獻》36期，頁45-65。

楊曉珞，2009。〈第一屆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研討會〉《原教界》28期，頁90-91

（[http://www.knowhow-design.com.tw/demo/alcd/User\\_upload/pub/1329205451851.pdf](http://www.knowhow-design.com.tw/demo/alcd/User_upload/pub/1329205451851.pdf)）（2012/9/28）。

楊曉珞、雅柏甦詠·博伊哲努，2009。〈鄒族美學知識〉《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6期，頁55-80。

藍姆路，2009。〈地方知識的流動性——以阿美族吉拉米代部落 malati'ay 為例〉《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6期，頁193-216。

羅香林，1992（1933）。《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書局。

鍾肇政（總召），2001-2006《台灣客家族群史》（總論、產經、語言、民俗、移墾、社會、政治、學藝）。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出版。

#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and Hakka Knowledge System

Cheng-Feng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ork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houfeng, Hualien, TAIWAN*

## Abstract

We start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knowledge and social epistemology,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location and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Secondly, by employing ethnocentrism to understand how culture influences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we look into how coloring epistemology may help to break up the iron cage imposed by epistemic racism. In the following two sections, we endeavor to understand the attempts to develop Indigenous and Hakka knowledge systems respectively. Finally, we draw upon our own experiences as testify to the former theoretic discourses.

**Keywords:** Indigenes knowledge system, Hakka knowledge system, social epistemology, coloring epistemology